

從網絡到實踐

——一個中國左翼青年集體經濟組織的案例

● 李皓玥、王詩煒

摘要：本文以當代中國左翼青年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聽晴嶺」為案例，通過文本分析、參與式觀察和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青年為何從網絡政治認同走向線下集體實踐，以及這種實踐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得以維持。研究發現，在鄉村建設傳統、後疫情時代就業壓力與網絡媒介聯結的共同作用下，部分青年將原本存在於網絡空間中的左翼認同轉化為集體生產、共同生活和政治實踐的線下實驗。然而，當政治理想進入具體的經營與日常生活後，成員面臨生存需求、組織效率與政治原則之間的持續張力。為維持這一集體實踐，聽晴嶺通過結構分化、話語整合和情感凝聚三重相互協調的機制，使不同活動邏輯獲得相對獨立的運行空間，將市場實踐重新納入政治意義框架，並通過共同勞動、共同生活與應對外部壓力形成組織凝聚力。本文通過這一仍在生成中的案例，揭示青年政治認同如何在具體組織關係和日常實踐中被重新解釋和持續塑造，有助於理解當代中國青年社會思想的實踐轉向和組織邏輯。

關鍵詞：左翼青年 政治認同 網絡媒介 集體經濟組織 新鄉村建設

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與意識形態多樣化的時代背景下，當代中國部分青年開始探索不同於主流僱傭關係的替代性生活方式。本文所考察的「聽晴嶺」組織，正是由一群左翼青年自主創建的獨特的農村集體經濟企業。相較於傳統的合作社經濟，他們更多地將自己定位為革命實踐的「先鋒隊」，將集體農場視為意識形態學習與政治動員的基地，將集體經濟的運營本身理解為對資

本主義秩序的批判性抵抗。這種特殊的勞動轉型實踐成為理解當代中國青年政治觀念的重要切入點^①。

聽晴嶺最初是由左同志等人於2024年7月招募志同道合的網友所建立的線上左翼社群。2025年初，成員在南方某農村承包農村土地，正式建立線下農村集體經濟企業，主要經營家禽養殖、經濟作物種植以及文旅業務，並於周邊城鎮拓展餐飲、外賣分部（D市飯店），後來因土地產權糾紛停止線下農場業務；目前在延續城鎮餐飲業務的同時，正在籌劃創建新的農場基地。

從成員構成上看來，成員以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男性為主，半數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主要為理工科背景（土木工程、農學、計算機等），部分成員曾從事建築工人、程式員、網絡主播等職業。從加入動機看來，成員在學生時期便關注時事和政治議題，表現出對左翼理論的濃厚興趣與高度認同。尤其身處互聯網時代，他們常圍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新左派」等左翼思潮在網絡平台討論相關政治議題，被視為「網絡左翼」。由於就業壓力和失業困境，在集體農場建立後，部分成員加入了組織的線下勞動。除約二十名線下成員外，該組織目前建有六百人以上的線上交流群組，並吸引逾萬的社交媒體平台粉絲。

在具體運作上，他們以左翼思想為指引，嘗試民主決策、工分制、公共資金池等集體經濟模式，弱化傳統私有企業中的工資、層級要素。聽晴嶺沒有正式意義上的負責人，重要事項原則上由成員共同討論決定。不過，創始成員由於掌握更多組織信息和外部聯繫，在實際運行中仍承擔較多協調責任，形成了非正式的核心位置。在線下業務之外，組織同樣與線上社群保持密切聯繫，常在社交媒體賬號上分享農場生活、記錄勞動日誌，也定期組織線上學習會、辯論會，帶領網友共同討論書籍和理論。在線下日常生活中，成員採取集體住宿和共食，他們將農場老屋改建為集體宿舍，每日三餐由值日成員統一準備。成員日常作息固定（上午8時30分至中午12時、下午2時30分至6時勞動，晚間進行會議或學習），特別強調每周雙休，嚴格限制加班，以反對資本邏輯下對勞動者的剝削。閒暇時間會進行讀書會、桌上遊戲、野炊等集體娛樂安排。

收入分配上，集體收益的七成存入公共資金池，用於農場的建設發展；剩餘部分為成員的基本生活費，每人月均60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並按照工分進行獎勵。總體上成員生活費佔比低，私有財產空間被壓縮，個體生活深度嵌入集體之中。

正是這種獨特的組織形態，使得聽晴嶺在實踐過程中面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作為後疫情時代的中小型初創企業，其生存依賴於市場競爭，不得不遵循效率、利潤、短期見效等資本邏輯；另一方面，其左翼認同要求成員反對資本市場邏輯，堅守民主平等、共同體價值與階級立場，並向外部左翼受眾持續展演「先鋒隊」身份。這使成員陷入「市場經營者」與「左翼理想者」的雙重身份衝突。這一衝突並非局限於內部管理問題。聽晴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生態中運行，使得平台監管、政府干預、制度限制等政治框架也構成了組織生存的外部約束條件。